

增长 危机

世界经济面临的逆风加剧 如何走出经济增长的迷雾

[美] 丹比萨·莫约 (Dambisa Moyo) 著 王雨晴 译

EDGE OF CHAOS

Why Democracy Is Failing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and How to Fix It

中信出版集团

增长危机

EDGE OF CHAOS

[美] 丹比萨·莫约 (Dambisa Moyo) 著 王雨晴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增长危机 / (美) 丹比萨·莫约著; 王雨晴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7
书名原文: EDGE OF CHAOS
ISBN 978-7-5217-0628-4

I. ①增… II. ①丹… ②王… III. ①经济增长—研
究. IV. ① 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7661 号

EDGE OF CHAOS

Copyright © 2018, Dambisa F. Mo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增长危机

著 者: [美] 丹比萨·莫约

译 者: 王雨晴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329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628-4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
但不知道一旦去做又要怎样赢得连任。

让－克洛德·容克
欧盟委员会主席

全球化的危机与救赎

吴 晨

《经济学人·商论》总编

回溯一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走势的分水岭。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遭遇重创，危机发源于美国，波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鲜有经济学家准确地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市场的放任和去监管会催生诸如“忍者”贷款（NINJA Loan，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人）这样高风险的市场行为？是什么让道德风险泛滥？为什么市场的激励导致银行家的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市场逐渐累积的长期风险？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倒”而不得不由政府兜底纾困，但是几乎没有银行家为危机肩负起个人责任？

莫约的《增长危机》，是金融危机 10 年之后为应对这一系

列问题而尝试做出的回答。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降级”的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而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危机，需要改良。

全球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疑。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3年，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政策的建树，脱欧是否有序，甚至脱欧与否，都仍然是未知数，而整个社会却被这个“人造议题”割裂深重。特朗普则代表了民粹主义大张旗鼓的叫嚣，它裹挟了全球化输家的怨愤——这些输家有全球化过程中工作流失的美国“锈带”的蓝领工人，也有那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屋被变卖的失房者，更涵盖过去20年薪资停滞的众多工薪阶层——却祭出了贸易“保守主义”的大旗，希望打破多边协商的贸易规则，挥舞美元结算和治外法权的“长臂”，重塑美国的“雄风”。

深入思考，进入21世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最大的失误的确是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失察。全球化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更好和更便宜的商品，也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但忽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忽略了资本在全球化盛宴中攫取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阶层的事实。全球化也是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飞速发展的时代。现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69个是跨国公司，31个是国家，“富可敌国”已成为现实。最近20年，欧美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如乘火箭般上升，加上股权和其他激励的金手套，标普

500 公司 CEO 的平均薪酬已经超过企业全职员工平均薪酬的 1 000 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薪酬差距平均只有 35 倍。

分配不公与贪婪，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之一，它背后是对弗里德曼提出的单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在金钱的驱动下，忽略了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也可能打击企业的长期价值。CEO 丰厚的股权激励，鼓励了企业的短视，越来越多手握巨额现金的大集团选择通过股票回购来推高股价，毫不避讳地帮助管理层管理股价，代价是对公司未来投资的减少。管理层与普通员工日益拉大的薪资差距，连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的孙女都看不下去了。她站出来指责迪士尼给 CEO 艾格的薪酬太高，她认为，如果把艾格每年 6 000 多万美元的薪酬平均分配，那足以给每位迪士尼乐园中拿着时薪 15 美元的员工涨薪 15%，还能剩下 1 000 万美元让艾格继续做富有的 CEO。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崇的“小政府”和“去监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竞争的活力，也避免了英美走入“高福利国家”的困境。但是 30 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概言之，可谓“三宗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政府投资不足，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维护和新建的投资乏善可陈；寅吃卯粮，政府债务高企，却仍然愿意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不努力增加盈余改善财政

状况。

莫约的《增长危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一是金钱政治的流行。企业在政策游说上的花费水涨船高，华盛顿成为说客和律师的纸醉金迷的大都会，选举政治以金钱开道，导致政客非但不能制约“富可敌国”的企业财团的扩张，反而有可能进一步被套牢。特朗普打着民粹牌，宣称要清空华盛顿的“污水”，而在施政中，他任命的许多官员是代表企业利益的“夹袋”人物，比如他任命的环保局长以前就是代表石油利益的说客。

二是选举政治日益缺乏竞争性。美国两党在议会选举中都特别热衷于划分选区，因为选区的划分可以把更多支持者划入一个选区，减少选举的竞争性。在最新的美国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出现几十个议员席位没有人挑战的局面。不受挑战的长期议员因为缺乏选民的监督而更可能代表利益集团。

三是党同伐异，甚至不惜政府停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屡屡发生，频次越来越高，恰是美国政治失灵的最好代表。

莫约提出的一些改良方案有些太理想，甚至带有一些精英主义的倾向，但是，莫约的讨论和建议仍然从侧面告诉我们，仅仅喊一喊民主加市场经济的口号，并不一定能给新兴市场带来发展的动能。与任何制度一样，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都需要设计、修改、更新。莫约发起的对于制度设计的讨论很重要，

只有不断改良和创新，才能重新找到制度的生命力。比如，针对年轻世代选举参与比例低的问题，莫约提出应该强制投票，处罚那些大选时不投票的选民，让每个选民都珍惜政治参与的机会，让投票成为每个公民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说，因为澳大利亚和瑞士已经实施了选举强制投票。

回到中国，《增长危机》也为探讨中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视角。如何确保我们能更好地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可调动巨大社会资源的大政府，如何能不断地提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制度、治理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调整着眼。

《增长危机》里提出的一些数据值得深思。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经常提“7、25、50”这三个数字，即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25%，但支出了全球福利的50%。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站在发达国家的视角，可以说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福利负担，也凸显了欧洲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当下的福利要求而付出了透支未来发展投资的巨大代价。的确，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缺乏有效的平衡，就可能成为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予取予求。但是，反向思考，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福利需求的增加，如果福利支出比率低于全球经济的占比，这样的短板迟早也得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的缺口，计

算下来大概需要 2 万亿美元。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设洲际公路的大手笔投资之后，在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上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因此道路桥梁年久失修问题严重。相反，日本一直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其中很多成为政客的分肥项目，使用率很低的“大白象”项目不少，基建对经济的整体拉动有限。

这给中国基建的未来提了个醒。经历了过去 20 年的快速建设之后，中国未来维护存量基础设施需要的投资将和美国的现在一样，巨大的投资就意味着未来巨大的维修成本。因此，好的计划不仅要研判未来基础设施使用的需求变化，还要至少把维修成本计入未来的投资。

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是多么贴切，“写一本书的过程就是一次奇遇。刚开始它像是一个玩具、一种消遣；随后它变成了你的情人、你的主宰，甚至变成了一个暴君；最后，你几乎心甘情愿被它奴役，这时你杀死了这个怪物，并暴尸于众”。

本书的写作过程大抵如此，但又不止于此。

我在牛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当我一直为经济问题（包括增长、不平等和发展）着迷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而非经济，将是未来几年促进人类进步与繁荣的关键动力。

受过西式教育或生活在西方的人（比如我），往往对那些一望而知的不够西方民主的国家有很多建议。然而，当谈到如何改善民主时，我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即使这一政治结构似乎面临挑战，改革需求也十分迫切。

在本书中，我试图探讨如何改善民主制度。虽然我的大部分青春时光都是在民主程度较差的州度过的，但成年之后，我却是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中工作和生活的。这些生活经历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观察、审视和反思不同制度的利弊。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观点供探讨。

与以前一样，我写出了一本我想读的书。当然，可能对许多政治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这其中会有一些瑕疵。

没有哪一本书是可以轻松写就的。如果没有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这本书很难面世。

怀利（Wylie）版权代理公司的团队——安德鲁·怀利、克里斯蒂娜·穆尔和詹姆斯·普伦一如既往地优秀。多年来，我还得到了一些优秀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他们都对本书给予了肯定——罗恩·比斯拉、刘晨和金·谢克特曼，在此，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劳动。

衷心感谢阿歇特出版集团（基础读物出版社）团队付出的巨大努力，是他们让我的梦想成真。

以智慧而勤勉的拉腊·海默特为首，布里安·迪斯特伯格、贝齐·德杰斯、考特尼·诺比莱、凯尔西·奥罗契克、阿利娅·马苏德、托马斯·凯莱赫、阿利·芬克尔、康妮·卡彭等人先后都在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制作等关键节点提供了帮助。在英国，蒂姆·怀廷和小布朗出版社团队同样给予了巨大支持。对于他们，我心怀感激。

杰里米·亚当斯、布兰登·普罗亚和乔迪·扬对本书的出版贡献颇多。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封面上，但本书同时也是他们的成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帮我给书中的观点和结构把关。对于他们，我将永怀感激。同时也要申明，本书的所有不当之处都是我个人的谬误。

克里斯季·布鲁萨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她，本书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我的生活，都会纷乱不堪。她坚定而执着的奉献精神、一直保持高效节奏和恒久不变的温柔可亲，让我的人生追求更加充实和愉悦。我非常感激她。

另外，我也万分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亲史蒂文·莫约和我的母亲奥尔良·莫约，我的亲人姆多勒·史蒂文、利娅和硕，他们不畏艰辛、始终如一地给予我坚定的关爱、支持和鼓励。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的妹妹玛莎·艾琳·赫里奎去世了，这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在世的时候，一直是那么自由不羁、热情洋溢和坚毅。

谨以此书献给她。

近 30 年前，柏林墙倒塌。混乱不堪、动荡不已、整个苏联阵营的发展几乎停滞的时期结束了，新的政体不仅在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出现，而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开始涌现，人们希望新的体制带来经济繁荣与和平。分析人员和经济学家相信，苏联的解体预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然而，近 30 年后，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世界再一次陷入混沌边缘。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对战后“冷战”秩序的不满情绪高涨。

这场危机导致西方出现政见不合的氛围（这也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以及在此之后的挑战领导人和掌权阶层的民粹运动，从抗议美国不平等和腐败现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欧洲反紧缩游行和中东的动荡。

2010 年 12 月，一名可怜的突尼斯水果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抗议他的货物被无故征收，未来经济收入无望，从而引火自焚。几周内，布瓦吉吉的自焚行为迅速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的群众抗议浪潮，在人民要求推翻政权的口号下，抗议活动遍及中东和北非，包括突尼斯、巴林、埃及、约旦、利比亚、苏丹和也门等。今天，这些地区仿佛陷入了一种新 30 年战争。¹

抗议活动也波及了南美、亚洲、东欧和南非等地，到 2014 年初，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经济体（150 个中的 65 个）预计将处于“高”风险或“非常高”风险的社会动荡中，为过去 10 年有记录的风险率之最。²

与此同时，各地愤怒的市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基辅，从曼谷到开普敦和瓦加杜古）迅速证实了这些预测。

300 万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和土耳其各地抗议，要求得到有关政治和经济前景的发言权；在曼谷，两年的抗议活动以军事政变告终；巴西一些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谴责这个每 15 人中就有 1 个穷人的国家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上花费了巨额钱财。³

这种日益高涨的政治焦虑浪潮并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反对紧缩、移民、收入不平等和全球化的运动也笼罩着发达国家。

2014 年 11 月，数十万人在布鲁塞尔大街上发生暴动，他们为反对欧盟批准的紧缩政策而纵火烧车。大约同一时间，反欧洲资本主义和战争运动组织的 5 万名示威者聚集在巴塞罗那，组织了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活动。

2016 年 7 月，柏林群众抗议德国对难民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难民人数在 12 个月内攀升至 110 万人。2016 年 9 月，大约 20 万民众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典参与集会，反对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在美国，麦当劳和沃尔玛的职工反对低工资制度，民意调

查显示了大众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关注，而此前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学者对此话题感兴趣。⁴

在目前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一些人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⁵与此同时，因导致失业和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民众对全球化一直怀有反对情绪，而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以及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这一反对情绪推向了高潮。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一种对统治美国政坛数十年之久的根深蒂固的政治体系的叛离。

乍一看，全球的这些动荡似乎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却被同一个线索串联了起来：普通公民对执政精英的无能和腐败表示愤怒。这是对政治决策受贸易和国际主义左右的谴责，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并没有像全球化支持者承诺的那样“水涨船高”，反而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这是对政府未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指责。

不管政府做什么，似乎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这一失败或许最令美国担忧——几乎整个20世纪，美国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不仅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依赖美国经济[美国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因为美国让其他国家看到了通向繁荣的路径，从而引发竞相效仿。⁶

从很多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来看，这种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实际工资水平不断降低，贫困率不断上升，贫困数据日趋增大，

就业数据也停滞不前。就收入而言，1979—2014年，美国前10%的人的工资上涨了1/3，工资中位数仅上涨了8%，而最底层10%的阶层的工资仅持平。现在，美国有2 000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1/12的美国家庭还在挨饿。此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公民比例从2000年的11%上升到了2012年的约16%。⁷从失业和就业不足两方面来看，失业情况在过去数十年全面恶化。举个例子，查尔斯·默里在2016年的报告中表示，“30多岁和40多岁的白人工薪阶层的劳动参与率从1968年的96%下降到了2015年的79%”。这意味着，从本质上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最佳就业年龄的男性中，有1/6没有工作。⁸1970年，制造业为美国约1/3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而在2010年，这一份额下降到仅为1/10。⁹欧盟也没有幸免于类似的就业颓势，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了40%，意大利的这一数字达到了37%，法国也有近1/4的青年失业。¹⁰

更糟糕的是，不仅美国的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摆脱赤贫的可能性也在下降。在过去的30年里，一个出生在美国收入分配底层25%的人通过努力晋升到前25%的可能性已经减半。同时，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5年，中产阶级在美国成年人口中占比50%，比1971年的61%有所下降”。¹¹

此外，美国家庭一直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因